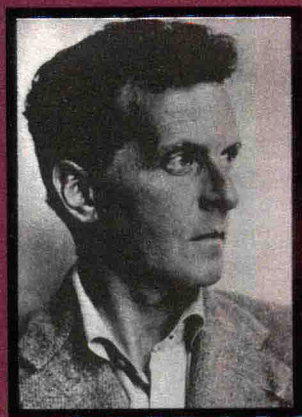


韩林合 主编

维特根斯坦文集

第 2 卷



Ludwig Wittgenstein

逻辑哲学论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韩林合 主编

维特根斯坦文集

第 2 卷

逻辑哲学论

韩林合 编译



2019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维特根斯坦文集,第2卷,逻辑哲学论/(奥)维特根斯坦著;韩林合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ISBN 978-7-100-16461-0

I.①维… II.①维…②韩… III.①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Ludwig 1889-1951)—文集②《逻辑哲学论》 IV.①B561.59-53②B8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7463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维特根斯坦文集

第2卷

逻辑哲学论

韩林合 编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6461-0



2019年1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9 1/2

定价:38.00 元

总 序

维特根斯坦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其思想对二十世纪的世界哲学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在其在世时,他只正式出版过一本哲学著作,即《逻辑哲学论》。在他逝世以后,他的学生和朋友遵照其遗嘱从他所遗留下来的约2万页手稿和打字稿中陆续整理出版了大量著作,其中最重要者当属《哲学研究》。200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与挪威卑尔根(Bergen)大学维特根斯坦档案馆合作,编辑出版了电子版《维特根斯坦遗著集》(*Wittgenstein's Nachlass: The Bergen Electronic Edition*)。其中包括了维特根斯坦的所有遗留下来的手稿和打字稿。这套中文版《维特根斯坦文集》主要就是以这个遗著集为基础编译而成的,同时我们也参考了国外已经出版的相关的纸质著作,特别是德国祖尔卡姆普(Suhrkamp)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维特根斯坦《著作集》(*Werkausgabe*)(1984年版)。

我们的编选目标是“精”,而非“全”。将《维特根斯坦遗著集》全部翻译出版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国外迄今出版的纸质维特根斯坦著作长期以来由不同的编者编选而成,前后没有统一的编选原则,可谓“杂乱无章”。我们制定的总的编选原则是:选择维特根斯坦不同思考阶段有代表性的或者比较成熟的遗稿;尽量

保持原稿的连续性、完整性；不收录维特根斯坦的讲课笔记、口授笔记。按照这些原则，《维特根斯坦文集》拟收录如下作品：

《战时笔记(1914-1917)》(第1卷)

《逻辑哲学论》(第2卷)

《哲学语法》(第3卷)

《哲学研究》(第4卷)

《数学基础研究》(第5卷)

《心理学哲学研究》(第6卷)

《心理学哲学笔记(1948-1950)》(第7卷)

《最后的哲学笔记(1950-1951)》(第8卷)

在翻译过程中，许多重要词汇的中译让我们颇费心思。在此，有必要对几个一再出现的词汇的翻译做些解释。我们知道，在德语中，“Satz”既具有“句子(语句)”的意思，也具有“命题”的意思。也即，既指单纯的合乎句法规则的书写符号串或声音符号串，也指这样的符号串所表达的意义，进而还指负载着这样的意义的如是符号串。(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用“Satzzeichen”来表示第一层意思。)大多数情况下，区分开这些不同的用法是容易的。但是，在少数段落中，区分开它们并不容易。出于统一性和简单性的考虑，我们在译文中大多数场合下用“命题”来翻译“Satz”。读者在阅读时可以自己根据上下文来确定维特根斯坦到底是在哪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

如何翻译“Bedeutung”这个词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其前期著作中，维特根斯坦主要是在弗雷格所赋予其的那种专门意义上使用“Bedeutung”一词的：一个名称的 Bedeutung

即其所表示(所代表、指称)的那个对象——其承受者。(不过,与弗雷格不同,维特根斯坦不认为他所谓的名称还具有弗雷格所谓的“Sinn”。)因此,在《〈逻辑哲学论〉研究》(2000 和 2007 年版)中我将这种意义上的“Bedeutung”翻译为“所指”,将其动词形式“bedeuten”译为“指称”;进而,将包含着其的复合词“bedeutungslos”译为“没有所指”。(另外,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有时又在其通常的意义上使用“Bedeutung”及其复合词。这种用法出现在评论 4.442、5.233、5.451、5.461 等之中。类似的做法也出现在弗雷格那里。)在三十年代初以后,特别是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弗雷格和他自己以前对这个词所作的那种技术性使用完全不合乎语言惯用法,严重混淆了一个名称的 Bedeutung 与其 Träger(承受者)。他进而认为,一个语词的 Bedeutung 就是其在语言中的用法或使用。显然,这里维特根斯坦是在其通常的意义上使用“Bedeutung”一词的,即用其指通常所谓意义。因此,后期维特根斯坦所使用的“Bedeutung”一词应当译作“意义”。相应地,其动词形式“bedeuten”——在必要时——不妨改译为“意谓(或意味)”。

与“Bedeutung”和“bedeuten”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德语词“Meinung”及其动词原型“meinen”。“bedeuten”和“meinen”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如果我们 meinen 了一个表达式,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它便 bedeutet(意谓)某种东西。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我们都将“Meinung”和“meinen”译为“意指”。按照前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解,所谓意指是指赋予一个语言表达式以意义的心灵过程;而按照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解,所谓意指就其主要用法来说是指

一个表达式的使用者知道自己能够正确地使用这个表达式(即知道自己能够按照人们惯常使用它的那种方式或者说人们所教给他的那种方式使用它)。在大多数情况下,当维特根斯坦要表达这样的意思时,在有必要时,他都正确地使用了相应的动名词形式“Meinen”。不过,有时他——比如在《哲学研究》第 186、639、666 节中——却在这种意义上使用“meinen”的名词化形式“Meinung”。但是,这个名词化形式在德语中只有意见或看法的意思。安斯考姆有时忽略了维特根斯坦的这种错误使用,因此将比如第 639 节中的“Meinung”译作“opinion”。(不过,她将第 186、666 节中的“Meinung”分别正确地译作“mean-ing”和“your meaning one thing or another”。)德英对照第四版改正了这个严重错误。

我们还要注意,三十年代以后,维特根斯坦常常在与上述意义上的“meinen”和“Meinung”同义的意义上使用“intendieren”和“Intention”。而且,有时他又在这种意义上使用“beabsichtigen”和“Absicht”。在本文集中,我们将“Intention”和“Absicht”,进而其动词形式“intendieren”和“beabsichtigen”均译作“意图”。另外,维特根斯坦也常常在这些词的日常意义上使用它们。通过上下文,读者不难看出其具体的意义。

德文“Wollen”一词的中译也颇难定夺。从哲学上说,其最为重要的用法是充当“Wille”(意志)的动名词形式,意为意志的行使。汉语中的“意志”这个名词没有相应的动词用法,而“意志的行使”这种译法不仅不简洁,而且在许多语境中根本无法使用。一些译者将其译作“意愿”;我们以前曾将其译作“意欲”,也曾经将其译作“意使”。但是,这些译法显然都不准确,或者过于人为。不过,

在本译稿中,我们还是权且将其译作“意欲”。这样译的一个好处是照顾到了“wollen”的日常的意义。

同样难于处理的还有“Vorstellung”这个词。在维特根斯坦这里,这个词的最为重要的意义大致相当于休谟式的哲学家所说的印象(impression)和观念(idea)。二者均可以看成宽泛意义上的“心灵形象”(mental image),简言之,“心象”(image)。这种意义上的“Vorstellung”义同于“Vorstellungsbild”(想象图像)。维特根斯坦有时又在动词意义上使用“Vorstellung”。这时,其意义为:形成或唤起心象进而使用它们的心灵活动。此种意义上的“Vorstellung”我们译作“想象”(英文为“imagination”)。有时,维特根斯坦又在叔本华、康德等哲学家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时我们将其译作“表象”。

关于本文集的编辑体例,如下几点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维特根斯坦大量使用了引号。通常他用双引号来表示引用,单引号来表示引语之内的引语。但是,他有时也这样单独地使用单引号;提醒人们注意,其内的文字有特别的用法或意义。在通常的德语文献中,双引号也有第二种用法。中文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因此,译文中在维特根斯坦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单引号的地方我们统一改用双引号。另外,在写作中维特根斯坦大量使用了破折号。实际上,许多使用并非是不必要的。而且,他使用破折号的方式有些特别:他通常用德语中的常规破折号即一短线“—”表示同一个思路中的短暂的停顿,用加长了的常规破折号“——”表示话题或说话者的转换。(后者大致相当于中文中的常规破折号的长度。)不过,由于无论是在德语还是在中文中,(常规的)破折号

本来就具有这两种功能,而且在具体的语境中区分二者并不困难,所以在我们的译文中,我们只使用了中文的常规破折号。

第二,在相关手稿和打字稿中,维特根斯坦以斜线、交叉线或删除线的形式删掉了大量文字或段落。不过,有些段落和相关上下文中并非是不好的或不必要的。因此,我们酌情保留了少数这样的段落。另外,在相关手稿中,在许多地方维特根斯坦提供了两个甚至于多个可供选择的表述(所谓“异文”)。但是,现已出版的纸质维特根斯坦著作常常只是直接选择了其中之一,而并没有告诉读者这些可能的表述的存在。当然,在许多地方,这些可供选择的表述只是具有修辞学上的意义,而无实质上的区别。但是,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本文集中,在有必要时,我们将以脚注的形式给出可供选择的表述。在没有必要这样做时,我们均按照惯例做出选择——通常选择的是维特根斯坦给出的最后一个可供选择的表述形式。

第三,在十分必要的地方,我们以脚注的形式对维特根斯坦行文中的相关内容做出了简单的注释。

第四,维特根斯坦所谓“评论”(Bemerkung)构成了其所有遗稿的基本写作单位。一个这样的评论有时仅仅由一句话或一段话构成,有时由两段甚或多段话构成。不同的评论之间一般会有一行或两行的间距。在一些打字稿和手稿中,维特根斯坦在评论前面加上了数字编号。但是,在许多打字稿和手稿中他并没有这样做。为了体例上的统一和读者引用上的方便,我们在编入该文集的所有文稿中均加上了这样的数字编号。

本文集的后期编辑工作受到如下项目支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人是遵守规则的动物’之论题研究”，项目号 15AZX017；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规范性研究”，项目号 16JJD720003。

本文集的编译和出版工作是在商务印书馆陈小文和关群德两位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在此表示感谢。

韩林合

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外国哲学研究所

2017 年 6 月 20 日

本文集所用编辑符号意义如下：

黑体字	表示遗稿中的一重强调文字
黑体字	表示遗稿中的二重强调文字
着重点	表示遗稿中的三重强调文字
删除	遗稿中删除之字符
甲//乙//	乙为甲之异文
背影	遗稿中由斜线或交叉线所划掉的段落
[...]	手稿中难以识别的字符
【补加文字】	本文集编译者所加文字

本文集每卷编译前言或脚注中出现的 MS 101、MS 102 等等为冯·赖特(G. H. von Wright)所制定的维特根斯坦遗著编号体系中的手稿号, TS 201、TS 202 等等为其中的打字稿号。“MSS”和“TSS”分别代表多个手稿和打字稿。相关手稿和打字稿均载于电子版《维特根斯坦遗著集》。

注释中手稿号或打字稿号后由冒号所分隔开的数字指相关手稿或打字稿的页数。

编 译 前 言

《逻辑哲学论》(*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 Trak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是二十世纪最为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其写作和出版均有一部曲折的历史。

《逻辑哲学论》是以若干本笔记(手稿)和打字稿为基础整理而成的。

1912年初,维特根斯坦注册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本科生,后成为高级研究学生,随罗素学习逻辑和哲学。1913年9月初,维特根斯坦到挪威专心从事思考和写作。至9月底他写出了一部关于逻辑的手稿。在9月20日给罗素的信中他写道:

类型还没有得到解决,但是我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这些思想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现在我总是有这样的感觉:我必死于能够发表它们以前。这种感觉一天天变得强烈起来。因此,我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可能早地向你传达我到现在为止所做的所有事情。不要以为我认为我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不能不有这样的感觉:它们能够帮助人们避免某些错误。或者我错了?如果是这样,请不要留意这封信。我当然无法判断我的思想在我死后是否值得保存下来。或许我

思考这样的问题根本就是可笑之举。但是,如果是这样,请原谅我的愚蠢的举动,因为它不是一种肤浅的愚蠢之举,而是我所能做出的最深刻的愚蠢之举。我意识到,我越往下写越不敢说出我的目的了。但是,我的目的是这样的:我想请求你允许我尽可能早地与你会面,并且给我以足够的时间,以便向你概要地描述我到现在为止所做的事情的整个范围;如果可能,请让我当着你的面给你做些笔记。……我知道,向你提出这种要求可能既狂妄又愚蠢。但是,我就是这样的人——随你怎么看我都无所谓。^①

10月2日,维特根斯坦回到了剑桥。随即他便向罗素解释他的思想。但是,罗素发现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不是很容易理解,并且他也难以一下子记住他所说的东西。于是,他找了两个速记员帮忙。维特根斯坦先后以英语和德语向他们口授了他的思想的摘要。同时,他还以英文向罗素口授了他在挪威所写的手稿中的一些内容,罗素做了记录。10月10日,维特根斯坦离开剑桥,返回挪威继续其思考和写作。回到挪威后,他从已经写好的德文手稿中节选出了一部分寄给罗素。它们与他此前在剑桥向罗素口授的部分手稿合在一起组成了所谓“手稿一”、“手稿二”、“手稿三”和“手稿四”。在维特根斯坦走后,罗素找人将他的速记摘要打印出来,并于1913年冬至1914年春期间将维特根斯坦寄给他的全部手稿译成

^① Ludwig Wittgenstein: *Cambridge Letters. Correspondence with Russell, Keynes, Moore, Ramsey and Sraffa*, ed. B. F. McGuinness and G. H. von Wright, Oxford: Blackwell, 1995, pp. 39-40.

英文。这个摘要和四份英文手稿合在一起被称为“逻辑笔记”(Notes on Logic)(在冯·赖特的维特根斯坦遗著编号体系中被称作 TS 201a)。在此期间,罗素还重新排列了这些材料的顺序,并给每一个主要的部分都加上了标题(在冯·赖特的维特根斯坦遗著编号体系中被称作 TS 201b)。1914 年,罗素将经他整理的“逻辑笔记”送给了考斯泰罗(J. J. Costello),因而后来冯·赖特将其称为“考斯泰罗本”。前一种未经整理的形式被称为“罗素本”,现保存于加拿大麦克马斯特(McMaster)大学罗素档案馆中。在维特根斯坦逝世后,考斯泰罗本“逻辑笔记”先是于 1957 年发表在《哲学杂志》(*Journal of Philosophy*)第 LIV 卷上,后作为附录 I 于 1961 年发表于《1914-1916 年笔记》(*Notebooks 1914-1916*)第一版中。在《1914-1916 年笔记》1979 年第二版中,罗素本取代了考斯泰罗本。

回到挪威后,维特根斯坦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逻辑思考和写作(或许还是在同一本笔记中)。1914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4 日,穆尔(G. E. Moore, 1873-1958)来访。维特根斯坦让穆尔看了他到此时为止所写的德文手稿(在此,值得指出的是,作为“逻辑笔记”和“向穆尔口授的笔记”的基础的这部德文手稿——或者说,这本笔记——已佚),并以英文向穆尔口授了其中的最新的成果。后来,穆尔的笔记(在冯·赖特的维特根斯坦遗著编号体系中被称作口授笔记 301 号)以“在挪威口授给穆尔的笔记”(Notes dictated to G. E. Moore in Norway)的名称(穆尔给予它的名称是“维特根斯坦论逻辑,1914 年 4 月”[Wittgenstein on Logic, April 1914])作为附录 II 于 1961 年发表于《1914-1916 年笔记》第一版中。

穆尔离开以后,维特根斯坦继续其手稿的写作。但是,似乎成果甚微。在1914年5月或6月份写给罗素的信中,他写道:

我的工作在近4至5个月期间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现在我又处于疲倦的状态,既不能工作也不能向你解释我的工作。……这样的状态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此后我的工作才会有所进展。^①

在此期间,他在所住的旅馆附近的湖边山腰上建了一所小木屋。

1914年6月底7月初,维特根斯坦回到奥地利度假。但是,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爆发。7月28日,奥匈帝国正式向塞尔维亚宣战;8月6日,向俄国宣战。8月7日,维特根斯坦作为志愿兵参加了奥匈军队。随即随(炮兵)部队开往处于奥俄边境的克拉科夫(Krakau)。8月9日,维特根斯坦便开始了其战时笔记的写作。开始两周的笔记只有私人部分(以密码的形式写出),哲学性部分始自于8月22日。至是年10月30日,他写满了第一本笔记(在冯·赖特的维特根斯坦遗著编号体系中被称作MS 101),并即刻开始了第二本战时笔记的写作。在12月份给罗素的信中他写道:

如果我死于这次战争中,那么我会让人将我以前给穆尔看的那本手稿和我现在在这次战争中已经完成的一本手稿一

^① Ludwig Wittgenstein: *Cambridge Letters. Correspondence with Russell, Keynes, Moore, Ramsey and Sraffa*, p. 87.

并寄给你。如果我还活着,那么战后我会到英国向你口头解释我的工作——如果你认为这样做合适的话。^①

从1914年12月9日开始,维特根斯坦被分配到所属部队总部的一所车间工作。在这里他享受到了相对安全和舒适的工作环境。至1915年6月22日,维特根斯坦完成了第二本笔记(在冯·赖特的维特根斯坦遗著编号体系中被称作MS 102)的写作。在此后一段时间中,维特根斯坦所做的哲学方面的工作具有总结性质。这点可以从他1915年10月22日写给罗素的信中看到:

在过去一段时间我做了相当多的工作,而且我认为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现在,在此我正在从【我所写的】所有东西中进行摘录,并将所摘录出的东西以一本论著(*Abhandlung*)的形式写下来。在给你看这些东西之前,我绝不会出版它们。但是,这当然只有在战争结束后才有可能。不过,谁也不知道我是否会活到那一天。假如我到那时已经死了,那么请让我的家人将我的所有手稿——包括最后的摘录(*die letzte Zusammenfassung*)(一系列散页,用铅笔写的)——寄给你。要理解所有这些东西你或许得做出一些努力,但是请不要因此而被吓倒。^②

① *Ludwig Wittgenstein: Cambridge Letters. Correspondence with Russell, Keynes, Moore, Ramsey and Sraffa*, p. 91.

② *Ludwig Wittgenstein: Cambridge Letters. Correspondence with Russell, Keynes, Moore, Ramsey and Sraffa*, p. 103.

这个用铅笔写的由散页构成的摘录稍后被整理进一本笔记之中。维特根斯坦的摘录基础是他到那时为止所写的所有笔记——包括两本战时笔记即 MS 101 和 MS 102, 在挪威给穆尔看过的那部手稿。这种总结工作于 1916 年 3 月下旬暂告一段落。这时, 他再度被派往前线。

1916 年 3 月底, 维特根斯坦开始写作第三本战时笔记(在冯·赖特的维特根斯坦遗著编号体系中被称作 MS 103)。不过, 4 月 15 日以前的笔记只含有私人部分。哲学部分的笔记是从 4 月 15 日开始的。9 月份, 维特根斯坦回到维也纳休假。在休假期间, 他着手从他所写的东西中整理打字稿(部分以向打字员口授的形式)。他可能打印出了两部打字稿。打字稿的基础是他到此时为止写的所有手稿(笔记)——挪威手稿, MSS 101、102、103(部分), (以散页和笔记本的形式出现的)摘录。

秋季休假结束后, 维特根斯坦于 9 月下旬到摩拉维亚(Moravia)的奥尔姆兹(Olmütz)军官学校接受训练。出发前他随身带有未完成的手稿 MS 103 和在维也纳整理出一份打字稿; 此外, 或许还带有其它手稿——比如在 1915 年 6 月至 1916 年 3 月中旬所做的那本摘录或论著。在受训期间, 维特根斯坦继续其 MS 103 的写作, 同时对所带的手稿和打字稿进行修改和补充(以附加手写稿纸的形式)。整个 12 月份他只写了一则笔记(2 日)。圣诞节前夕, 维特根斯坦的受训结束。在维也纳作短暂停留后于 1917 年 1 月 9 日返回前线。在此期间, 他继续写作 MS 103。不过, 所写的内容非常有限。MS 103 的私人部分在 1916 年 8 月 19 日就结束了。哲学部分结束于 1917 年 1 月 10 日。